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阈中的抗日战争

陈答才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科基础教学部,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权威的中共党史教科书都从“史”的角度归纳过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然而从“论”的视角阐释抗日战争推动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研究抗日战争胜利的深远意义,对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亦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92(2011)02-0001-04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历经近90个春秋,其间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但贯穿全过程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共产党宣言》发表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壮大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升华,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近9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的,第一个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也是随着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形成的。正是有了这个第一次飞跃,有了第一个理论体系,才推动和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关于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比较权威的史书都有其概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概括了两条:“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提供

了一个军力、经济力都不如敌人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武装侵略的经验,为被压迫民族独立、求解放的斗争创立了一个范例”^[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抗日战争“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3]。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4]。这些论断从“史”的角度准确地归纳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笔者认为,从“论”的视角阐释,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具有上述意义,而且推动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之所以说抗日战争推动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由在于:

第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当然,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党的早期领导人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历经了自觉追求和初步探索的过程。例如,1918年8月,李大钊在其《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论述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的方法论时就指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

收稿日期:2010-12-05

作者简介:陈答才,男,陕西蓝田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础教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

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53]。1923年，他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51]197}。1924年，恽代英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63]9}。1927年，蔡和森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应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7]。瞿秋白在同年也有过大意相近的论述。然而，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时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此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8]这一任务提出后，立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走向成熟。

第二，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政治上成熟、组织上坚强的中共领导集体。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它确立了毛泽东在实际上的领导地位，但那时还没有从组织上予以确认。前述六届六中全会另一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连毛泽东自己都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9]。这样，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便从组织上得以确立。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血与火的洗礼和政治锤炼，换言之，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推进，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届一中全会又选举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我们通常说的“五大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领导集体，也是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事实上，正是这样一个坚

强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在这一时期成熟的中共领导集体成员和理论工作者都在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自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后，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相继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和前途（包括阶段划分）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逐步系统化。朱德不仅在1943年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概念^[10]，而且在1945年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辩证法分析中国的政治，同时也分析中国的军事”^[11]。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的1939年7月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中第2节的标题是“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比较集中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12]103-108}；1941年7月在《答宋亮同志》的复信中再次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1945年5月的《论党》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出席了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并在9月30日报告统一战线工作。但因时局危急，报告后他即从延安赴武汉，机智果敢应对、处置前方战事和后方统一战线工作。即便如此，1943年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时，他仍系统总结了“廿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13]，并强调“整风要从思想方法搞起，从马列主义世界观搞起，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我们的正确思想”^[14]。任弼时1941年发表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15]234-235}。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又发言总结党24年的历史，“它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生长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有了自己的领袖，奠定了今后不会犯错误和取得胜利的基础”^{[15]392}。除以上党的核心层领导积极推进，反复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彭真1939年1、2月

间在晋察冀边区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也说：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16]。1940年初，张闻天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品^{[6]45}。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如艾思奇、杨松等，都有专题文章从学理上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从而大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第四，这一时期不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的推进，认识上的日益深化，理论上也不断得到提升。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贡献仍然最大。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提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展开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说：“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17]611}“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17]614}随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17]707}。需要指出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来看，“相结合”与“中国化”两个概念是一致的。换言之，“中国化”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达，容易大众化；“相结合”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达，体现严谨性。两种表述的含义没有实质的区别。尽管毛泽东在此后的著述中比较多的是将“相结合”作为标准称谓使用，但“中国化”这样的通俗化表述也在使用。彭真在1939年曾说“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在“曲折历程中的最大进步”。张闻天在1940年又说“运用马列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是发展马列主义”，从而初步阐述了马列主义“运用”与“发展”的关系。1941年到1942年，学者张如心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

等文，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好体现”，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到中国环境中来，如何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表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日益深化，并接近历史飞跃前的“振翅”。

第五，这一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体系。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日益深化的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就是七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做了系统总结，而且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把毛泽东思想规范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2]319}的思想，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思想”^{[12]332}。刘少奇在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12]332}。“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2]333}。刘少奇在回顾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后，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和内容，他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的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及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及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2]335}至此，毛泽东思想被全党所认同和接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形态。正是在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继之，又用3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此，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

世界的东方。

综上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实践意义是深远的，理论价值是永恒的。它已经为后来的第二次飞跃提供了经验和启迪，也必将为今后的第三次、第四次飞跃提供历史智慧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
- [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846-847.
-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75.
- [4] 胡绳.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24.
- [5]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蔡和森.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1.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928.
- [9] 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21.
- [10] 朱德. 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N]. 解放日报，1942-07-01.
- [11] 金冲及. 朱德年谱（1886—1976）：上卷[M]. 新编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189.
- [12]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3]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38.
-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893—1949）[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561.
- [15] 任弼时. 任弼时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6] 《彭真传》编写组. 彭真年谱：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00.
- [1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On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 Perspective of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a

CHEN Dacai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 Courses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an 710062 , Shaanxi , China)

Abstract : Generally , authoritative teaching books of the CPC history narrate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 However , narr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s ,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 is also of importance to study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 the CPC's development and the whole change of China.

Keywords : anti- Japanese war ;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ese conditions ; promoting role